

高职教育动态与学习



高等职业教育研究所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目 录



高层动态

- 陈宝生 贯彻落实五中全会精神，职业教育要在“五入”上下功夫..... 3
- 陈子季 从“层次”到“类型” 职业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5



专家解读

- 任占营 职业教育提质培优的现实意义、实践方略和效验表征..... 11
- 王 烽 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几个关键问题..... 19
- 姜大源 基于类型本质的职业教育治理问题..... 22
- 聂 伟 培训：新时代职教改革发展的新引擎..... 26
- 徐国庆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应从何入手..... 29
- 夏仕武 中国特色学徒制如何有效实施..... 32



国际视野

- 人民日报 职业教育，各国政府持续发力..... 35

贯彻落实五中全会精神，职业教育要在“五入”上下功夫

11月8日，2020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全国启动仪式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改革试点赛开幕式在山东省潍坊市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出席活动并讲话：

要按照五中全会要求扎实推动职业教育改革，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次活动是贯彻落实五中全会精神的一次实际行动，也是对部省共建山东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的实践检验和成果展示。要按照五中全会要求扎实推动职业教育改革，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围绕高质量发展大力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探索职业教育发展规律，为做好职业教育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提供实践支撑。

今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进行改革试点，要探索完善办赛机制、补齐短板

一是树旗。要扛起国赛的大旗，扛起当今世界职业技能大赛中国队的大旗，将来跻身著名大赛行列，办出世界水平的大赛。

二是导航。要通过大赛，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未来定向，引导发展方向和重点，建立良性发展有效机制。

三是定标。要通过选手比拼，促进职业教育课程建设、人才培养、校企合作等标准不断更新和升级。

四是催化。要通过大赛推动促进职业教育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培育更多技能“苗子”，孵化出更好的成果。

贯彻落实五中全会精神，职业教育要在“五入”上下功夫，为“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进一步创造条件

贯彻落实五中全会精神，职业教育要在“五入”上下功夫，为“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进一步创造条件，努力建设技能型社会、建设技能中国。

一是“长入”经济。要使职业教育成为经济活动的内生变量，成为构成产业链、产品链、供应链、资金链、信息链的“砖瓦”和基本要素，走好长远发展之路。

二是“汇入”生活。要高度重视技能在人民群众高质量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增加技能含量，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三是“融入”文化。要合理看待学历和能力关系，增加文化中的技能含量，在全社会建设技能文化，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四是“渗入”人心。要认识到没有技能寸步难行，使具有技能成为做人的“标配”，推动形成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的良好氛围。

五是“进入”议程。要使职业教育进入各级党委和政府议事日程，纳入规划、政策体系、议事规则、预算保障，发挥好职业教育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信息来源：教育部网站 2020 年 11 月 9 日

作者：陈宝生，系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

从“层次”到“类型” 职业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2月8日，教育部召开第三场教育2020“收官”系列新闻发布会，陈子季司长介绍“十三五”期间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总体情况。

“十三五”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职业教育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摆在了前所未有的突出位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教育部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坚持把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综合改革的突破口，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在健全办学体制、完善育人机制、提升内涵质量、增强服务能力、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目前，全国共有职业学校1.15万所，在校生2857.18万人；中职招生600.37万，占高中阶段教育的41.70%；高职（专科）招生483.61万，占普通本专科的52.90%。累计培养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专科毕业生5452万人，开展社区教育培训约3.2亿人次。回顾这五年，主要有五大亮点。

一是最大的贡献，就是确立了职业教育的类型地位。

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开宗明义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正式确定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是一个单独种类的教育。这一重要定位，一方面，是对职业教育的重大理论贡献，明确了职业教育是一个教育类型，而不是教育层次，对于摆正职业教育的地位，发挥职业教育服务社会 and 个体发展的能力，以及推进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发展战略意义，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理论；另一方面，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和实践意义，明晰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联系与区别，指明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有利于职业教育系统更明晰自己的功能和作用，进一步探索和完善职业教育独特的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更好地服务、支撑国家现代化建设。以类型教育为基点，我们牢固确立职业教育在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位置，围绕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强化类型特色，坚定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

二是最大的突破，就是构建起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职业学校体系结构更加合理、定位更加清晰，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大幅提升。在纵向贯通上，巩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强化高等职业教育的主体地位，稳步推进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特别是 2019 年以来，教育部批准 22 所学校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打破了职业教育止步于专科层次的“天花板”。在横向融通上，加强职业教育、继续教育、普通教育的有机衔接、协调发展。面向在校生和全体社会成员广泛开展职业培训，促进学历教育与非学历培训衔接连通。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遴选了 92 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推进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建设，确定国家级社区教育实验区 129 个、示范区 120 个，建成 28 所省级老年开放大学。加快学分银行建设，促进资源互享、课程互通、学分互认，畅通各类人才成长通道。

三是最大的进步，就是迈入了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在制度标准上，建立了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各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协同发展职业教育的合力；《职业教育法》修法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制定中等职业教育德育大纲、中等职业学校公约，规范德育工作，完善专业目录、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顶岗实习标准、专业实训教学条件建设标准五位一体的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体系，发布中职专业 368 个，高职（专科）专业 779 个，本科层次职教试点专业 80 个，修（制）订并发布 347 个高职和 230 个中职专业教学标准、51 个职业院校专业实训教学条件建设标准、136 个专业类顶岗实习标准。启动实施了“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高水平实训基地等重大项目。在协同育人上，坚持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强化教学、学习、实训相融合的教育教学活动；推行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工作过程导向教学等教学模式。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布局了 558 个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覆盖 1000 多个专业点，惠及 10 万余学生（学徒）；印发《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健全企业参与制度，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依托行业职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发布近 60 个行业人才需求预测与专业设置指导报告。在“三教”改革上，连续举办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强化教师教学能力建设；推广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遴选公布 232 门在线精品开放课程，建设 203 个职业教育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发布中职公共基础课程方案和七门课程标准，遴选约 4000 种“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四是最大的成就，就是培养了一大批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

在服务国家战略上，全国职业学校开设 1200 余个专业和 10 余万个专业点，基本覆盖了国民经济各领域，每年培养 1000 万左右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 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显著提升。制订实施《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2016-2020 年）》，加快培养制造业紧缺人才。在服务区域发展上，实施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推进“东西职业院校协作全覆盖、东西中职招生协作兜底、职业院校全面参与东西劳务协作”三大行动，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设备超过 18 亿元，共建专业点 683 个、实训基地 338 个、分校（教学点）63 个，共同组建职教集团（联盟）99 个，就业技能培训 14 万余人，岗位技能提升培训 16 万余人，创业培训 2.3 万余人。在服务脱贫攻坚上，职业院校 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千万家庭通过职业教育实现了拥有第一代大学生的梦想。“职教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成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见效最快的方式。例如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开展的“一人学厨，全家脱贫”帮扶培训项目，就是职业教育助力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的典型。“十三五”期间，共创建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示范县（市、区）261 个。在促进教育公平上，中职免学费、助学金分别覆盖超过 90%和 40%的学生，高职奖学金、助学金分别覆盖近 30%和 25%以上学生。用三年时间扩招 300 万人，服务“六稳”“六保”，踢出了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临门一脚”。

五是最大的亮点，就是实现了更高水平的开放。

在向产业开放上，配合国家发改委培育 800 多家产教融合型企业、试点建设 21 个产教融合型城市，构建了以城市为节点、行业为支点、企业为重点的产教融合新模式。成立 1500 个职业教育集团，3 万多家企业参与职业教育；鼓励多元主体组建职业教育集团，确定 150 家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联盟）培育单位。在向企业开放上，组建 56 个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发布近 60 个行业人才需求预测与专业设置指导报告。遴选了 73 家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绝大多数是行业龙头企业、“小巨人”企业。现代学徒制试点参与企业 2200 多家。在向世界开放上，与 7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稳定联系，有 400 余所高职院校与国外办学机构开展合作办学，成立海外独立举办的第一所高职院校“中国-赞比亚职业技术学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设“鲁班工坊”，打造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品牌。

“十四五”期间，职业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职业教育战线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对标对表《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和《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以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为总目标，切实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奋力把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殷切期盼转化为职业教育战线“大有作为”的生动实践，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

中国青年报记者：

陈司长好，刚才听到您关于“十三五”期间职业教育发展的有关情况的介绍，想请您再具体谈谈“十四五”期间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思路和举措，特别是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和高地建设方面有什么样的打算？另外您刚才提到 2019 年以来教育部批准 22 所学校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打破了职业教育止步于专科层次的“天花板”，在这方面，想问一下教育部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

陈子季：

关于职业教育的适应性问题，有三点要把握好。

第一，要深刻把握职业技术教育的类型特征是什么。我们讲职业教育，就是一种面向人人的终身教育，面向市场的就业教育，面向能力的实践教育，面向社会的跨界教育。所以我们要把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落实到我们的办学体制、我们的育人机制，还有我们的教学方式方面，要牢牢把握这个。

第二，要构建国家技能开发体系。这对职业教育来说是外部环境问题，我们正在起草相关文件，要整合现有的一些政策举措，优化资源配置，特别是要落实陈宝生部长提出的职业教育“长入”经济、“汇入”生活、“融入”文化、“渗入”人心、“进入”议程这五个“入”，来消解职业教育国家需求与企业需求、个体需求之间因为错位带来的发展困境。

第三，要构建融合、多元、开放的职业教育发展新格局。这里主要是要处理好陈宝生部长提出的五个关系，即“普职关系定类型，产教关系定供求，校企关系定模式，师徒关系定方法，中外关系定特色”。

关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问题，我前面已经介绍过，“十三五”期间我们主要是以陈宝生部长提出的建立健全以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双轨”运行为标志，以纵向贯通、横向融通为核心，同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和深化教育改革相适应的新时代的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把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的工作重心转到提高质量上来，实现我们职业教育的提质培优和增值赋能。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围绕基于“双轨”的双通制，重点抓好三个环节。

一是制度保障，有三件事要做，第一件事就是要建立职教高考制度，我们依托这一制度，把中等职业教育和职业专科教育、职业本科教育在内容上、培养上衔接起来，任何职业院校的学生都可以通过职教高考制度进入任何一个职业院校的任何专业学习。

第二件事是健全普职融通制度，主要在课程共享与学生流动两个层面来进行，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资源共享和理念的相互借鉴。

第三件事是健全国家资历框架制度，规定职业教育的学生和普通教育的学生学习成果等级互换关系，进而规定在特定领域两个教育系列的学生都享有同等权利的制度。

“十四五”期间，我们还要在促进体系有效运行的支撑条件方面加以完善，主要是六个方面：

一是搭建产业人才数据平台，持续深化、跟踪各行业职业人才需求的数据，及时准确地发布人才需求报告，科学引导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招生规模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

二是完善专业教学标准，以标准建设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抓手，深度开发以职业能力清单和学习水平为核心内容的专业教学标准，为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和建设提供制度保障。三是产教融合型企业：探索混合式的办学方式，建立基于产权制度和利益共享机制的校企合作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

四是教师的专业化培训体系要健全。要建立大学培养和在职教师教育齐头并进的双轨制的职业教育教师专业化培训体系。

五是完善教育教学的质量监控体系。要确立全面质量管理理念，建立健全全员参与、全程监控、全面管理的质量保障体系。

六是健全公平的升学和就业制度。通过制度设计，确保职业教育轨道学生在升学、求职、工作待遇、职务晋升等方面都享有与普通教育轨道学生平等的机会。

关于职教本科的问题：2019年以来，教育部审批了22所职教本科，现在主要是推动独立学院转设，优质的高职院校可参与独立学院的转设。之前已经有两所独立学院转设成职业大学，现在独立学院转设工作正在推进。我们正在研究，下一步将在高水平的高职院校中，选择一部分专业，经过一定的程序审批后，举办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

总台央广记者：

请问陈司长，今年两会的时候，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了今

明两年高职院校要扩招 200 万人，请问目前这项工作的进展怎么样？另外，还想知道教育部在确保扩招人员的培养质量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谢谢。

陈子季：

高职扩招工作是 2019 年开始的，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高职院校要扩招 100 万，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今明两年继续扩招 200 万。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对职业教育也是个大好的发展机遇。所以，我们通过分列招生计划、分类考试评价、分别选拔录取的方式，让更多的达到条件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职业教育。去年我们完成的任务比较好，相比于 2018 年，2019 年高职扩招超额完成了 116 万，今年的高职扩招工作进展也比较顺利。

高职扩招以后，也确实面临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生源多元化问题。原来以普通高中毕业生、中职毕业生为主，现在还有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高素质的农民、在职企业员工等，生源多元化了。这些不同的生源，他们的需求也是多样化的。所以，如何保证质量型的扩招，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一是精准设置适合扩招生源特点的专业。比如，陕西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针对职业农民、乡村干部特点，设置涉农单招专业，开展职业农民包括村干部的学历提升。对于退役军人，设置了社会工作、党务工作、救援技术等专业。

二是精确制定培养方案，灵活组织教学。围绕着不同职业方向，分类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提供个性化、菜单式培养方式。比如，对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等，我们实施旺季去工作、淡季来学习的错峰教学。对高素质农民、村两委委员、相对集中的在岗职工，做好送教下乡、送教上门，设立社区学区、企业学区，就近实施集中教学。同时，实行了弹性学制、弹性学期、弹性学时，学业年限三到六年。

三是精细强化日常管理。加强分类管理，实施单独编班，积极引导扩招群体参与学生工作，对学习成果实施多元评价、过程性评价。山东、湖南等省通过退役军人学生推选老班长、党员、立功受奖人员担任班委和学生干部，开展一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

四是精心构建服务保障体系。畅通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的衔接渠道，将扩招群体纳入到“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等项目。加强就业创业指导，开好职业生涯规划 and 就业指导课程，为扩招群体提供优质的网络教育培训资源。

信息来源：教育部网站，12 月 8 日，教育部召开第三场教育 2020 “收官”系列新闻发布会

作者：陈子季，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

职业教育提质培优的现实意义、实践方略和效验表征

在深入分析职业教育提质培优现实意义的前提下，从内涵发展、品牌培育、人才培养、服务贡献等维度明确了实践方略；从体系完备性、制度健全性、标准完善性、条件充足性、评价科学性等方面提出了效验表征，对推动职业教育战线落实《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一、职业教育提质培优的现实意义

（一）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抓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职业教育，把职业教育摆在前所未有的突出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要求，指出发展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并针对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办学方向、办学格局、育人机制、价值追求、舆论导向等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从现实意义看，职业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经济社会联系最紧密，既是教育、也是经济、更是民生。在我国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加快推进职业教育提质培优，构建与经济社会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对振兴实体经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打造我国未来发展新优势意义重大。

（二）落细落小职教 20 条的重要载体

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简称“职教20条”），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这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制度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逻辑起点。职教20条印发后，国家密集出台“双高计划”、产教融合型企业、职教集团、教师队伍建设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教育部会同山东、甘肃、江西、江苏等省份陆续启动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建设，职业教育大改革大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如何在“十三五”收官和“十四五”开局阶段，定好总目标、踢好“头三脚”、谋好新长效，成为职业教育战线面临的首要问题。在这个关键节点，国家启动实施《行动计划》，将其作为落实职教20条和谋划“十四五”发展的桥梁和载体，对各项改革任务进行再分解、再部署，引导职业教育战线从“怎么看”转向“怎么干”，向改革的“最后一公里”要效益。

（三）应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现实挑战的重要举措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城镇化、国际化进程加速，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面临着生源多样化、教育信息化、办学国际化等诸多现实挑战。从国内看，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对技术技能人才提出了新要求，并且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由大众化阶段进入到普及化阶段，特别是2019年高职百万扩招实施以来，职业学校生源类型进一步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如何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诉求的学生提供个性化、定制化、多样化教育服务，成为现阶段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内部挑战。从国际看，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格局的转变正加速我国优质产能“走出去”，伴随产业变迁与转移进程，职业教育必须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的技术技能人才，为中国企业海外生产经营培养符合其用人标准的本土化人才。职业教育如何融入世界职教话语体系，梳理“中国经验”，制定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标准，形成“中国方案”，打造走向世界的中国职教品牌，是全球化发展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外部挑战。

二、职业教育提质培优的实践方略

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需要和教育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是新时代我国教育领域的主要矛盾，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一矛盾将进一步突显。办好公平有质量、类型特色突出的职业教育，基点是坚持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不同类型、同等重要的战略定位，路径是夯实基础、补齐短板、深化改革、激发活力，目标是通过职业教育提质培优为经济社会增值赋能。

（一）提质：提高职业教育发展质量

所谓提质，至少要从教育结构、人才培养、治理水平三方面提升职业教育质量。结构质量的核心是完善体系建设，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是推进“三教”改革，治理质量的核心是构建多元参与的质量治理格局。

1. 提高结构质量

结构包含了组成整体的层次、比例以及组合关系，具体到职业教育，其结构质量就是看体系纵向层次、横向比例以及与不同教育间的相互关系，能否支撑纵向贯通、横向融通。在纵向层次建设上，要巩固中等职业教育基础地位、高质量发展专

科高职教育、稳步推进本科职业教育试点，推动形成层次分明、结构清晰、功能定位准确的职业学校体系。在横向比例上，应将职普比放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来谋划，从政策要求向政策与市场“双轮驱动”过渡，通过办好公平有质量的职业教育，在质量上与普通教育大体相当；通过健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使接受职业教育与接受普通教育的机会成本大体相当；通过优化政策环境，使职业教育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与普通教育培养的人才社会待遇大体相当。在相互关系上，要加强制度保障，一方面，使各层次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培养过程贯通衔接，畅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另一方面，推动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等相互融通、协同发展。

2. 提高培养质量

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强的根本原因是培养质量不高，具体表现是学生成长收益不高、获得感不强。推动职业教育质量革命，教师是主力军，课堂是主阵地。首先，教师双师双能是先导。职业学校应以培养“双师型”教师、打造专兼结合的教学创新团队为重点，一方面要提高教师双师素质，在构建“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体系上下功夫；另一方面要优化双师结构，推动固定岗流动岗相结合、校企互聘兼职的人事管理改革，开启校企人员流动“旋转门”。其次，教材建设是基础。职业学校应适应学生特点创新教材形态，同时强化教材内容的应用性与实践性，及时将产业发展新要求、新标准、新工艺、新方法等引入教材。再次，教法革新是途径。职业学校应坚持以学生为中心，适应生源多样化特点，一要深化学分制改革、实行弹性学制，制订个性化、多元化培养方案和学业生涯规划，为学生提供更多选择的教学制度；二要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对接职业标准和企业真实岗位工作过程，探索模块化教学、项目化教学等组织方式，提高教学实效，着重提高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素质与能力的全面发展。

3. 提高治理质量

提升治理能力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提质培优的行动保证。治理和管理最大的区别在于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职业教育是跨界的教育，政府、行业、学校、社会都是职业教育的治理主体，提高治理质量，首先要理顺利益相关方的权责关系，构建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学校自治、社会监督的质量治理格局。在政府层面，应强化宏观管理，完善职业学校办学质量考核机制，推进办学体制改革和育人机制改革，建立健全办学质量考核结果运用的长效机制。在行业层面，应建好用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提升行业举办和指导职业教育的能力。在学校层面，应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校内规章制度体系，健全职业学校内部治理结构，

深入推进职业学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建设，切实发挥学校质量保证主体作用，将内涵、特色、高质量内化为一种行动自觉。在社会层面，应健全学生、教师、学校、家庭、社会多方参与的学业考核评价体系，发挥专家组织和第三方社会机构在质量评价中的作用，完善职业教育质量年报发布制度。

（二）培优：培育职业教育特色品牌

所谓培优，就是要打造一批职业教育发展的样板和品牌，着力提高职业教育辨识度、认可度和吸引力。

1. 以高地为载体，打造职业教育区域品牌

发展职业教育的主责在地方，进一步落实地方主体责任，是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关键。在国家财税体制改革，特别是拨款方式变化的背景下，《行动计划》提出实施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建设行动，按照东部提质培优、中部提质扩容、西部扩容提质的思路，开展整省试点和城市试点。整省试点侧重区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和体制机制改革，打造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模式。城市试点侧重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打造职业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样板。通过高地建设，调动和保护省、市、校三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快形成中央和地方改革同向同行、信号不减，各地因地制宜、比学赶超的工作格局。

2. 以学校为载体，打造职业教育学校品牌

学校是职业教育体系中的最基本单元，学校办学质量直接决定了职业教育质量。近年来，我国先后实施示范（骨干）校、优质校、“双高计划”等项目，建成了一批国内一流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总结出扶优扶强、示范引领的成功经验。《行动计划》延续以往做法，在学校和专业建设方面，全面改善中职学校办学条件，遴选一批优质中职学校和优质专业，增强中职教育吸引力，推动落实职普比大体相当，为学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提供多样化选择；扎实推进国家“双高计划”，遴选一批省域高水平高职学校，建成一批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基地和技术技能创新平台，支撑国家重点产业、区域支柱产业发展，引领新时代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

3. 以国际化办学为平台，打造中国职教国际品牌

扎根中国、融通中外是教育对外开放的根本遵循。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需要扩大职业教育对外开放，通过引进来、走出去、再提升，加快培养国际产能合作急需人才。一方面，要以“鲁班工坊”建设为载体，推动职业教育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探索“中文+职业技能”的国际化发展模式。另一方面，要探索师生互相交流、研修等合作项目，引进融合输出符合本土化和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教学资源，共享中国职业教育模式，提升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

（三）增值：夯实人人出彩的发展基础

所谓增值，就是要增加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成才价值。一方面，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处理好“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另一方面，要树立面向人人的职业教育观，适应生源多元化和差异化，实现人人出彩，促进社会公平。

1. 以“三全育人”为抓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要针对职业学校学生的学习特点、行为习惯、思维模式等，建立区别于普通教育、体现职教特色的育人体系，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实现这一目标，既要做优资源，以优质丰富的教学资源作为强力支撑；也要做活形式，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还要做强队伍，精心培养和组织一支会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政工队伍，并引导专业课教师加强课程思政建设，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在日常、做进课堂、做到个人。与此同时，还要建立起行之有效的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强化参与主体之间的沟通联系，形成学校、家庭、企业德育教育闭环，促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 以职教考试招生制度为纽带，畅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渠道

考试招生制度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立交桥”的关键一环，也是职业教育改革的“牛鼻子”。推进改革首先要明确目标和方向，一方面通过考试招生制度牵引中等职业教育改革，稳住中职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培养质量，也就稳住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底盘；另一方面通过考试巩固高职教育基础，从入口解决职业教育类型不突出、吸引力不强、质量不高的问题。在考试内容上，要处理好考什么的问题，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评价方式，发挥好考试招生制度对教与学的引导作用。在考试组织上，要处理好怎么考的问题，加强省级统筹，严格规范考试的标准、内容和程序，要实施好职业技能考试的环节，按照专业大类统一制定职业适应性测试标准、规定测试方式，提高职业教育考试招生的公平性和信誉度。

（四）赋能：提升职业教育服务贡献率

所谓赋能，就是要通过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撑和技术技能积累，发挥职业教育在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中的独特功能和价值。

1. 以服务为重点，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服务决定地位，有为才能有位，只有真正把办学思路转到服务发展上来，实现职业教育供给与产业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职业教育才能被认可。首先，要立足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持续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职业学校和专业布局，推动职业教育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同频共振、有效衔接，不断提高职业教育供给水平。其次，要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在核心技术开发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支柱产业发展中发挥支撑作用、在中小微企业成长中发挥引领作用”为愿景，打造一流的产教融合平台、人才培养与技术创新平台、技术技能平台，推动核心技术产品转化。再次，推进产教融合发展、校企协同育人，创新建设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载体，全面推行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完善投入与利益协调制度，形成政府、行业企业和社会力量多方参与的多元办学格局。

2. 以育训并举为抓手，服务全民终身学习

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终身教育，要树立大职业教育观，推动职业教育与其他类型教育协调发展，支持先学习再就业、先就业再学习、边就业边学习。首先，充分发挥职业学校育训并举职能，满足不同人群、不同层次的学习需求，广泛开展企业职工技能培训，积极开展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高素质农民等人群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培训，大力开展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其次，要完善继续教育的服务资源和服务机制，促使职业教育从学历教育逐步转向学历教育、社会培训和技术服务并举，主动向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拓展，积极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

三、职业教育提质培优的效验表征

政策生命力在于执行，执行水平主要看成效。如何感知和衡量执行的成效？《行动计划》提出“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更加完备、制度更加健全、标准更加完善、条件更加充足、评价更加科学”，既是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总体目标，也是检验《行动计划》执行成效的效验表征。

（一）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职教体系更加完备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长期处于“点题”到“破题”的进程中，结构不清晰、层次不完整的问题长期存在。随着职教20条的出台和实施，中国特色职业教育重要制度与模式呼之欲出。因此，能否构建起支撑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职业教育体系框架，是《行动计划》执行成效的基本线。检验这一成效，

至少应有两条标线，一是纵向形成相对完备的职业教育学校体系，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双轨”运行，中等职业教育、专科职业教育、本科职业教育自下而上无缝衔接，技术技能人才学业提升、职业晋升、社会地位上升的通道畅通；二是横向打破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等之间的壁垒，实现不同教育间的横向融通，学业证书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等不同学习成果间能够相互认定、积累与转换。

（二）充满活力、相互支撑的法律制度更加健全

制度是社会系统的基本架构，具有促进经济效率和实现资源分配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更完善、更具活力的制度体系是检验《行动计划》效度的重要内容。在法律法规方面，国家形成以《职业教育法》为统领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和落实监督机制，各地结合实际制定或修订地方性法规，职业教育的法制化水平大幅提高。在制度层面，促进体系有效运行的支撑条件和制度保障基本完善，推动职业教育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由追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

（三）程序规范、动态更新的标准化建设机制更加完善

标准化建设是统领职业教育发展的突破口，是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的显性表征，包括标准建设的统一化、系列化、通用化、组合化、模块化等。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的标准化建设工作仍有空白点，加快完善标准体系和落实机制仍是《行动计划》执行期的工作重点。在机制上，职业教育标准制定、实施、监督机制基本健全，国家、地方、行业层面的职业教育标准体系衔接有序，职业教育标准化水平整体提高。在建设上，标准制定程序规范，行业组织、领军企业积极参与，形成标准动态更新机制，标准质量不断提升。在标准执行上，各地结合实际出台高于国家层面标准的地方标准，职业学校执行标准的意识普遍增强，标准先行、质量为先成为职业教育治理共识。

（四）投入多元、保障有力的办学条件更加充足

办学投入和办学条件是职业教育提质培优的物质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办学基本条件不达标，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就无从谈起。一方面，要形成符合职业教育特点，政府投入为主、多元多方支持的职业教育经费筹措机制，实现新增教育经费向职业教育倾斜，实现职业教育生均拨款制度提标扩面，形成与办学规模、培养

成本、办学质量相适应的财政投入制度；另一方面，要经过不断努力，实现中职学校办学条件基本达标、管理水平总体规范、培养质量整体提高，加快补齐高职扩招稀释的职业教育资源，持续推进高职教育高质量特色发展。

（五）多元参与、导向明确的质量评价更加科学

评价是教育事业发展的指挥棒，也是职业教育深化改革的“最硬一仗”。受到自身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影响制约，我国职业教育评价还存在着过度关注结果质量、强化模仿和趋同、依赖外部问责、依赖政府定量等不足。科学审视职业教育评价体系，一方面评价主体呈现多元化，政府、行业企业、学校、社会等多方参与的质量监管评价机制基本形成；另一方面评价内容呈现特色化，德技并修、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育训结合、学生获取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毕业生就业质量、“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等成为职业学校评价的重要内容。

“提质培优、增值赋能”是新时期党和人民对职业教育的殷切期盼，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职业学校提出的硬核要求。落实好《行动计划》，离不开国家的顶层设计，更离不开省级政府的统筹推进和学校的主动作为。在推进机制上，构建“国家宏观管理、省级统筹保障、学校自主实施”工作机制，夯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分工。在组织实施上，加强过程管理，及时通报执行情况，传递工作压力。在结果应用上，加强督查督导，将目标责任完成情况作为督查对象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将各地实施成效作为国家新一轮重大改革试点项目遴选的重要依据。随着《行动计划》的深入实施，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将更加完善，职业教育类型特征更加凸显，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办学活力不断增强，发展质量持续提高，不断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机与活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

信息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年第33期

作者：任占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

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几个关键问题

关于现代职教体系建设，有以下几个关键问题需要探讨：

第一、单轨还是双轨？

世界上关于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发展有单轨制和双轨制两种模式，而我国实行的是双轨并行的顶层设计。从整个教育体系来看，我国实行双轨制具有重要的意义。职业教育提供了成才的另一条通道。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对于整个现代教育体系建设来说尤为重要。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要求把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作为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而双轨制的关键也是中等教育阶段。中等职业教育的核心在于技术技能，即它提供现代职教体系中的技术技能基础教育。政策导向一直是“坚持普职比大体相当”，但目前这个比例已经越来越难以保持了。

应该如何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如果放任不管，可能大多数初中毕业生会升入普通高中，中职教育在职业教育的基础教育作用将难以发挥。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必须有新的思路，可以深入思考这样几个问题：中等职业学校是不是只能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中等职业学校是不是只能进行职业教育，可不可以为普通高中提供职教课程、在普通中小学开展劳动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机构是不是只能提供中等教育学历？部分中等职业学校是否可以建成一个以职业教育为基础的终身教育机构，职能包括开展劳动力转移培训、闲暇教育、为普通高中提供职业模块课程以及实施中等职业学历教育等？

第二、就业还是升学？

职业教育是就业导向而不是升学导向，这是我们一贯的提法，现在也没有改变。但是，目前中职毕业生升入高职院校、高职毕业生升入本科院校的比例越来越大，这还是不是就业导向？客观来讲，就业导向是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突出特征。也就是说，不只是职业教育，整个高等教育都应该把就业作为一个重要导向。

关于学生就业还是升学，可以进行适度的引导，但最终都应该是个人选择、市场选择，而非制度安排的结果。如果制度安排违背了市场选择和家长、学生的意愿，必然会产生矛盾冲突。所谓就业导向，实质上就是实用技术技能导向。职业教育以

就业为导向，并不是单纯要控制升学比例，而是要教给学生真正的实用知识，确保他们可以顺利就业，也为其升学提供充分机会。

当然，现在必须警惕这样一个问题：随着学生升学机会的增多，职业院校会不会也开始侧重升学和应试教育？如果职业学校没有能力向学生传授实用技能，那么必然成为与普通教育一样侧重应试升学的学校，也就丧失了职业教育的特性。

第三、“断路”还是“通途”？

我国现代职教体系建设从纵向来看，目前的瓶颈主要在本科层次。为了打通职业教育的上升通道，我们开展了本科职业教育试点工作。虽然本科职业院校的数量在增加，但发展相对缓慢，质量和含金量与社会期待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本科职业教育作为整个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重要突破口，要进一步加强系统规划。

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职教专业都应有本科层次，它必须与相应的技术技能体系层次相对应。有些职业或岗位的技术技能等级划分没有那么细，相应的专业层次区分度没有那么大，就没有必要建立从中专到本科的学历层次。所以，在哪些领域、哪些专业发展职教本科，这是需要大规模研究的问题。另外，职教本科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是什么？与应用技术本科相比，它的特殊性体现在哪里？不弄清楚这些问题，发展职教本科就没有明确的方向。

目前职教本科建设主要有三种途径：

第一种是原来的普通本科学校转为职教本科高校；

第二种是一些新升格的本科院校试办职教本科，主要是民办院校；

第三种是高职高专学校中一些办得好的专业试办本科层次专业。

这里我们联想到一项多年来进展缓慢的工作，就是部分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因此需要统筹考虑普通本科转型和职教本科建设的问题。目前本科转型陷入窘境，一些学校不愿意扣上“职业教育”的帽子。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应该从学校内部的一些专业或课程开始，建议先选择一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做得好的专业，举办具有职教特色的本科专业。只有办好了职教本科，现代职教体系才能完善起来。

第四、“独立”还是“融合”？

研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问题，必须将其放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来看待。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普及化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多数学校低门槛甚至没有门槛，首当其冲的就是职业院校。现在高等职业教育的入学门槛低是正常现象，但有些生源竞争已经不激烈的院校还在努力保住入学门槛。这不仅仅是简单入

学降低门槛的问题，更是一个深层次的制度问题。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必然会面临很多挑战，因为“高考”这两个字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多数大学入学时不需要经过专门的考试，是大众化教育体系的典型特征。

如果职业教育是一种类型，应当有其特定的入学标准和人才选拔方式，完全按照高考的模式肯定是不科学的。具体到“职教高考”，应该是“与职业类型特征相适应的考试升学制度”，其标准肯定与普通高考不同，如更注重技能考核。

职教高考是一个系统的体系问题，涉及从初中毕业到本科每一步怎样升学、怎样选拔人才。它在“唯分数”的应试教育之外为招生评价增加了一个客观标准，也就是技术技能的标准。另外，两个体系还需要融通，每个升学台阶前都应有通往普通教育的通道。

不少学者提倡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两种证书相通，但不能简单地互通，需要有一些共同的内容和基本标准，目前最现实的还是课程和学分相通。

信息来源：《教育与职业》2020年第20期

作者：王烽，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综合研究部主任

基于类型本质的职业教育治理问题

对于如何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如何实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治理，笔者认为：一定要关注经济发展的需求和个人终身教育的需求，这就要求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必须具有开放性、系统性。关注职业教育系统性，就要使职业教育从普通教育的办学模式向类型教育的办学模式转变。

为此，必须准确把握职业教育的三个典型类型特征：

一是跨界，即企业与学校联姻的合作跨界，是职业教育协同育人的结构形式和办学格局；

二是整合，即产业与教育链接的需求整合，是职业教育生存发展的功能定位和社会价值；

三是重构，即共性与个性并蓄的框架重构，是职业教育制度创新的设计方法和逻辑工具。

跨界是前提，整合是过程，重构是结果。职业教育协同育人的办学格局由一元主体转向二元主体，职业教育生存发展的社会价值由单一需求转向双重需求，职业教育制度创新的逻辑工具由单维思维转向多维思维，要求必须有跨界（物理的变化）、整合（化学的变化）和重构（生物的变化）的思考。

在此基础上，笔者想谈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关于职业教育体系构建。

之所以提出类型教育，是因为目前我国社会分工强调的是层次，是一种垂直分工的模式，如由低到高依次为技术工人→技师→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教授级工程师→科学家。问题在于，根据人才的垂直分工，教育也依此进行了垂直分层，导致社会普遍错误地认为“职业教育是低层次教育，学术教育是高层次教育”。笔者以为，我们应该秉持“社会分工是类型”的理念，将这种垂直分工转变为水平分工。为此，教育应根据“社会类型分工”的需要，培养不同类型的职业人才。职业教育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应用教育培养工程技术型人才，普通教育培养科学技术型人才等。但不管是职业教育、应用教育，还是学术型教育，每一种教育类型都有自己的层次，即“类型中有层次”。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

出状元”，“行”即类型，“状元”即层次，说的就是类型和层次的关系。升级版的中国教育，需要升级版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需要与普通教育等值而不同类型的升级制度。目前国家启动了1+X证书制度试点，1是学历，X是技能，通过两者综合反映学习者的能力。但是，目前职业教育还没有自己的分级和升级制度，1+X制度还需进一步拓展，为此需要加快建立涵盖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国家资历框架制度。教育需要进一步开放，职业教育要“走出去”，需要采取国际普遍通行的做法。

怎样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按照传统思维，就是参照普通教育，即你有什么、我就应该有什么，如普通教育有本科、职业教育也要有本科，普通教育有硕士、职业教育也要有硕士等，在层次上考虑过多常常会忽略类型的本质。需要注意的是，普通教育的每一层次都不可能构成完整的职业资格，因此不能按照劳动市场需求输送相应的职业人才。普通教育是以升学为导向的教育体系，而职业教育的每一级都能构成完整的职业资格，可随时根据劳动市场的需要输送相应的职业人才，因此职业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体系。

为适应科技发展，提高国民受教育的程度是非常重要的。但笔者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均受教育程度不是一次性实现的。人均受教育程度应该是在人的一生中多次完成的，所以必须考虑非正式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的教育途径，这样才能与正规的学校教育一起，构成一个开放、终身的教育体系。因此，我国要加快建立在国家资格框架以及学分银行基础上的多途径开放式现代教育体系。

第二、关于职业教育学科地位。

一直以来，职业教育只是一级学科教育学下属的二级学科。普通教育只有一个学习地点，即学校；而职业教育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学习地点，即企业、学校等场所。因此，职业教育不仅要关注学校的运作规律，还要关注企业的运作规律；职业教育不能只关注学习心理学，还要关注工作心理学；不能只关注学习过程，还要关注与学习过程相关的工作过程。职业教育的基础科学，也就是元科学，不能只有教育学或教育科学，还应有职业学或职业科学。所以，职业教育治理要跨界运作，就要坚持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工学结合。职业教育既要关注教育、学校和学习，也要关注职业、企业和工作。正是这两组三个要素构成了两个领域之间的跨界。完成跨界后要实现整合和重构，要在职业学和教育学之间架设一个互通有无的桥梁。职业教育的跨界性表明，只有一个学习地点的普通教育的参照系，是不适用于具有两

个或两个以上学习地点的职业教育的。然而，在教育领域，普通教育学无法覆盖的职业教育学，却只是教育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

同样，只有对跨界的教育进行跨界思考，对职业教育的学科地位才能有更加清醒的认识，才能更好地谈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类型的治理问题。目前，从事职业科学研究的人员寥寥无几。职业教育作为二级学科的地位，妨碍了有才华的青年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这一学科研究水平的不高，也与其学科地位紧密相关。职业学或称职业科学，是关于职业和职业教育至关重要的“所有的认识”的科学，是整合工作过程与学习过程的科学，它既不同于传统的应用性实践研究，也不同于传统的科学理论研究，是将实践与理论两者结合在一起开展有机研究的科学。这就要求：一要关注实际职业劳动所适用的具体知识和方法知识的研究与系统化；二要关注实用相关专业科学需阐述的具体知识和方法知识的研究和系统化。而职业教育涉及或覆盖的专业科学，涉及三大产业的方方面面。作为一种类型教育，职业教育是一个明显的交叉学科。最近，我国将交叉学科列为一级学科。例如，新增了集成电路专业为一级学科，并将其从电子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中独立出来。为此，笔者也希望通过职教界同仁的共同努力，在学科建设中提升职业教育的学术地位，从而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第三、关于职业教育管理职权。

作为人力资源供给的职业教育，相比普通教育，具有更加宽广的“频谱”：它所覆盖的教育生源更加宽泛，不仅有应届生源，还有非应届生源；它的教育途径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不仅包括正规教育的学校教育，还包括非正规教育的职业培训，还有非正式教育的自学、线上学习等；它的功能范畴更加广阔且具体，既重视个性发展的教育功能，也关注为服务社会发展社会功能。例如，稳就业就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功能。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为 1300 万~1500 万人，今年由于疫情只能实现 900 万人的就业目标，可是今年高校毕业生就有 847 万人，明年将超过 900 万人，也就是说每年新增劳动力的 60%~70%将是高校毕业生。这里说的还只是劳动力增量。我国还有那么多的农民工、转业退伍军人、结构性失业者以及大量的残疾人，总数高达 4 亿多人。对于这么多的劳动力存量，一方面，国家要千方百计保就业，采取多种灵活就业的措施；另一方面，为适应科技发展对职业人才的新要求，国家实行高职扩招、中职扩招，以优化劳动力存量。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职业教育扩招，使得职业教育占据更新的地位。这充分体现了职业教育是服务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

首要教育举措，是助力国家社会稳定治理的关键教育资源，也是提升国家人力资本质量的主旨教育类型。

目前，用人的劳动就业制度与育人的职业教育制度分离，劳动人事部门与教育行政部门在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管理职能上交叉，劳动市场的用人需求与职业教育的育人供给之间存在供需关系上的脱节。为此，建立国家职业教育综合管理机构，基于国家职业资格框架，对现代职业教育进行有效治理，是一个有效的措施。这方面我们有过很好的尝试。20世纪末，我国曾拟定过建立“国家职业教育署”方案，后于1990年成立“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就是一个由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劳动部联合组建的职业教育机构。但因各种原因，1992年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又分成两部分，分别划归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劳动部门主管。这些年，我们也有一些来自基层实践的成功案例。例如，河南信阳平桥区将负责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平桥职业教育体育局，与负责就业培训、劳动保障、劳务与涉外劳务的平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合并，成立“平桥职业教育与就业服务局”。

曾经的尝试和实践的智慧，促使我们期望朝着更为理想的愿景努力，即将“条条管理”变为“块块管理”，建议建立“国家职业教育总局”，将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职业能力建设司、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专业部委职业教育部门、行业职业教育机构以及工会、妇联等职业教育机构与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相关职能纳入。

综上所述，职业教育的一个根本特征就在于跨界。跨界的教育必须有跨界的思考。“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结论是：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

信息来源：《教育与职业》2020年第20期

作者：姜大源，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

培训：新时代职教改革发展的新引擎

《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强调职业教育的“培训”属性，将职业培训置于重要地位，这不仅是正本清源、做好职业教育元研究的理论诉求，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体现。开展职业培训是职业教育的应有之义，是职业院校办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典型体现，是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引擎。

培训是职业院校功能的再强调和再完善

从理论层面看，培训是职业教育的应有之义。我国使用的“职业教育”概念，与国际通用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TVET,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概念内涵相同。“职业教育”一词包括职业教育、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等诸多内涵，尽管日常使用概念时并不出现“培训”二字，但“职业教育”本身涵盖了培训的意思。

从政策层面看，培训是职业院校的法定职责。早在1985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明确要求职业学校除了可以为本单位和部门培训人才外，还可以接受委托为其他单位开展培训。1996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提出“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这是将培训作为职业院校职责的主要法律依据。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继续沿袭了这一规定，明确“职业教育包括各级各类职业学校教育和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一直“以学历教育为主、以职业培训为辅”，培训没有被纳入学校发展的“主责主业”，教育和培训“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等现象普遍存在，培训成为“教育短板中的短板”。培训中，还存在诸如教师主动性不强和培训能力欠缺、培训资源不足、培训内容针对性和适用性不够等问题，培训是职业教育发展的薄弱环节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行动计划》要求优质职业学校年培训人次达到在校生规模的2倍以上，就是对破解这一问题的有力回应。当前，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促进高水平就业、服务高质量发展已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取向，职业院校必须要高度重视培训，充分发挥培训的稳就业、保民生功能，这是职业教育培训功能的重申和回归。

培训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重要手段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一直是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和难点。为破解难题，近年来集团化办学、现代学徒制、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等举措相继实施，然而，培训却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当前校企合作普遍不够深入，其中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校企合作是单方面为学校培养人才，与企业关系不大，校企双方没有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和利益分配机制。随着校企合作的逐渐深化，校企互信不断增强，双方获利不断增多。企业尝试将岗前培训、转业培训、学徒培训、在（转）岗培训等业务交给学校承担，进而寻求在技术咨询服务、企业大学建设、职工培训基地建设、科研联合攻关等方面的合作，使学校有机会逐渐触及企业发展的商业核心和技术机密，为形成校企命运共同体奠定扎实基础。

可以说，培训作为深化产教融合的着力点，是校企合作深化的过渡阶段和助推剂，有利于增强学校和合作企业的黏性，更好服务于产业工人队伍素质提升，使校企合作实现“打井式”深挖，为企业升级和转型发展增值赋能。

培训是反哺教学、推动教学改革的有效途径

在职业院校内部，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分属不同的业务部门管理，按照各自轨道运行，普遍存在“两张皮”的现象，阻碍了专业教师参与培训，培训与教学交融难度大。一方面，专业教师已经承担日常教学、企业实践、技能大赛、学生管理等任务，工作量趋于饱和，培训变成额外工作负担；另一方面，从学校到学校成长起来的专业教师对生产一线的实际情况掌握不多，对企业员工的学习需求与动力缺乏了解，胜任企业员工培训工作有一定难度。此外，受绩效工资总额控制等制约，学校培训收入无法分配给专任教师，挫伤了专业教师参与培训的积极性。

培训和教学两张皮，对培训资源和学校资源造成双重浪费。职业院校应该积极推动育训结合，坚持以训哺教，促进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从现实情况看，不少具有行业背景的职业院校，将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并举并进、双轮驱动，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通过开展培训活动，学校把握了行业发展动态，跟踪了产业进步趋向；教师能获取企业最新信息，把生产管理和服务一线的技术、案例带到课堂，促进课堂教学对接生产岗位实践，切实增强课堂教学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吸引力。

培训是提高专业教师队伍素质的直接方式

专业教师应是学校培训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和执行者，但就目前职业院校承担培训的实践来看，教师参与较少、承担比例较低，多依赖企业专家或校外教师完成。面对社会阅历丰富的成年人，面对拥有技术技能经验的一线人员，培训必须生动、鲜活、有用、可靠，必须有效解决受训人员的直接需求，才能取得良好的培训效果。

承担培训任务的教师，一般多为“双师型”专业教师。从教师的维度看，教师培训行业企业人员，需要深入开展培训需求调研，熟悉一线情况，对接新经济、新技术和新职业，开发出适合的培训资源，凝练出有用的培训项目，研究制订出有效的培训方案、科学的培训标准和课程标准等，才能增强培训项目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从学校的维度看，学校要充分利用实习实训基地、产教融合型企业等平台，对具有发展成为培训师潜质和基础的“双师型”教师进行培训师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人力资源开发的知识和技术，掌握培训的方法和技巧，以驾驭学校和企业“两个讲台”，站稳课堂和车间“两个岗位”，建立稳定的校内培训师队伍。在此过程中，教师的实践技能必然得到有效锻炼、专业素质得到有效提升、教育教学观念得到有效升华，对个人专业发展具有直接推动作用。

培训是新时代职业院校改革发展新的增长点和着力点，是大幅提升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和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在“破五唯”的背景下和新一轮的“提质培优”行动中，将加大培训在职业院校评价中的权重，使培训成为职业院校增值赋能的重要评价指标。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应积极发挥职业院校在场地、设备、师资、专业、课程等资源方面的优势，支持职业院校面向在校学生和全体社会成员开展职业培训，使之成为职业培训的主力军和主阵地，为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提供坚强有力的支撑。

信息来源：《中国教育报》2020年11月24日09版

作者：聂伟，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所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应从何入手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这是新时代教育发展的新主题、新方向、新目标、新任务。我国职业教育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从完善基本体系、制度和标准入手。

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一是结构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正面临办学方向不明、规模逐步萎缩等问题。从国际经验看，无论高等职业教育如何发展，中等职业教育都必须存在。在坚持招生数与普通高中招生数大体相当的政策前提下，中等职业教育需要采取两条发展路径，一方面是基础性，中等职业教育不能以就业为唯一取向，要突出为继续学习奠定职业基础的人才培养取向；另一方面是多样化，在强化不同类型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差异的同时，还可举办新型特色高中，如机器人学校、工程师学校等，并通过把这些学校与高水平大学对接起来，培养更高水平的专业技术人才。

发展本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举办职业本科教育是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差别只在于具体办学形态。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重要动力是发展技术学科，以此促进科学研究成果的应用。当前，技术学位在我国正开始成为一种独立设置的学位，这为发展技术学科创造了很好的制度保障。我国产业技术升级，在加强学术性学科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技术学科的建设，这就需要发展职业本科教育。

二是纵向贯通与横向融通的动力机制建设。纵向贯通与横向融通是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两大核心特征。目前最为有效的动力机制是职教高考。职教高考内涵丰富，其功能不只是实现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结构性衔接，其更为根本的目的是整合多方面教育资源，形成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因此，职教高考不仅是职业教育内部的高考，还要把一部分职业教育中技术性强的课程，如信息技术、机械技术、电子技术、机器人技术、国际贸易等专业中的核心课程，纳入到普通高考的选考科目，让这些课程在地位上等同于普通高考中的物理、化学、历史

等科目。这不仅有助于普通高中学生在高中阶段学习实务科目，促进他们对高等教育专业的了解，从而更加理性地选择专业，而且能为他们进入高等学校相应专业学习奠定基础。

无论是提高职教高考的吸引力，还是打破对口招生模式，建立开放性的职教招生模式，核心问题均是扩大职校生对高等学校及专业选择的自由度。目前职校生的升学途径并不少，有三校生高考、自主招生、中高和中本贯通、五年制学校的内部自然升级，这些路径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选择性。通过职教高考将这些路径加以整合，可以扩大学生的选择性。

完善职业教育制度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支撑

一是校企合作国家制度建设。目前的校企合作，职业院校的期待似乎主要是从企业获得资金和设备的支持，这与校企合作的初衷有所偏离。一方面企业不是教育投资者，另一方面随着教育经费投入的增加，设备短缺情况已得到了很大程度缓解。理论上讲，职业院校最希望从企业那里获得的，应该是企业对人才培养过程的参与。所以应该把校企合作的国家制度建设聚焦到如何激发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积极性上来。同时也要对职业院校在合作中的五种行为进行约束：第一种是选择不具有人才培养能力，甚至主营业务与其专业内容关联度不高的企业合作；第二种是与企业合作的主要内容没有聚焦到人才培养；第三种是以校企合作为名向企业输送廉价劳动力；第四种是不对企业的人才培养过程进行指导、管理和监督，不了解企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执行情况；第五种是不对学生在企业学习期间的行为进行管理，不了解学生在企业的实际学习状况。

二是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制度建设。职教教师培养需要走出项目化的发展思路，着力于完整、系统的国家制度建设。职教教师的来源途径多元，培养主阵地应当从职前师范教育转向职后教师教育，并把教师培养与聘用直接挂钩。加强职教教师培养的制度建设要在完善教师任职的能力标准、实现不同来源途径教师的能力对接、建立规范的职教教师培养过程、发挥教师职业资格证书在教师培养中的支撑作用等方面重点关注。

三是国家资历框架建设。我们需要一种制度，能够在技术技能人才的技能水平与专业型人才、学术型人才的能力水平之间建立等值关系，以使他们在就业时能获得公平的社会待遇，这种制度，称之为“国家资历框架”。把技能等级水平与学历

等级水平对等，并要求确认取得某某等级技能水平的个体相当于拥有了什么学历，是对这一制度的误解。说到底，国家资历框架要解决的问题是劳动者的社会待遇不对等问题，而不是职业知识与专业知识、学术知识之间的教育等值关系问题。

完善职业教育标准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保障

一是职业分类与人才需求数据库建设。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就是要准确把握职业需求。首先要有完善、科学的职业分类体系。职业分类体系中对每个职业的描述内容要包括：职业工作内容描述；从业者心理条件描述，如技能、能力、兴趣、工作风格、工作价值等；职业的教育要求、职业资格证书要求、工资与就业趋势描述。其次要开发科学的职业标准体系，有些国家为了降低开发难度，只开发职业标准中最核心的内容——职业能力标准，我国在职业标准建立初期可采用这一策略。再其次要宏观掌握各种职业现有从业人员的状态数据，包括从业人员的总体数量、工资分布等，以及未来各产业的发展变化趋势和各种职业从业人员需求的变化趋势。职业分类、职业标准由于具有全国统一性，必须在国家层面进行建设；人才需求数据报告考虑到我国疆域辽阔、区域差别大，可以把建设职责下移到省市。

二是专业教学标准建设。在国家层面开发职业教育内容标准，既是为了规范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也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的服务职能，普遍提升职业教育课程建设水平。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开发有助于解决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方案开发中的两个问题：一是缺乏开发内容标准依据，二是缺乏开发所需要的原材料。一份优秀的人才培养方案，除了要精准定位人才培养目标，精确描述人才培养规格，还要深入描述专业教学的具体内容。职业院校对这个层面内容的了解总体是缺失的。

信息来源：《中国教育报》2020年12月01日09版

作者：徐国庆，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特色学徒制如何有效实施

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着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发展任务，职业教育在我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和“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发展目标。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是党中央基于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及我国紧迫的发展任务所提出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目标规划，明确中国特色学徒制的内涵及其实施路径，有助于全社会凝聚共识、形成力量、推动我国职业教育转型升级、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

中国特色学徒制需要坚持“三个面向”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这是邓小平同志1983年10月为北京景山学校的题词。“三个面向”思想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符合中国综合国力提升的战略需求。新时代，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仍然需要把坚持“三个面向”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方略。

面向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学徒制要求职业院校实时跟踪各行业、各领域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制度、服务标准，及时更新技术设备、管理制度、技术规范、培养方案，面向中国发达地区甚至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需求遴选学徒制的实践导师，强化协同配合和多形式的激励，努力培养能够适应和引领行业产业发展的高技能人才。

面向世界的中国特色学徒制要求职业教育进一步扩大开放，与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建立紧密联系，及时引进国外先进教材体系、课程体系、管理制度甚至导师队伍，围绕前沿领域开展国际合作，高起点地实施学徒制。

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学徒制要求职业院校在制定发展规划时要广泛研究，邀请研究未来学的专家学者和具有丰硕原创性成果的资深专家研判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前瞻性地设置专业和实施学徒制，实现各专业学徒制所培养的人才能够适应且引领社会各领域的发展。

中国特色学徒制需要扎根中国大地

探索形成中国特色学徒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立足中国大地办教育、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与社情的职业教育新道路的基本要求。中国最大的国情，一方面，人口众多，经济类型多，各领域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另一方面，经济总量大，在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制度下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的国情社情要求学徒制不能盲目搬用国外的发展模式，要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具有国际竞争力和中国特色的现代学徒制之路。

探索立足中国国情的特色学徒制需要从三方面着力。

一是推行线上线下混合式学徒制，解决中国职业教育规模大、一对一指导实践师资不足的现实难题。职业院校要规范管理制度，健全协调机制，与企业、行业等潜在用人单位的实践导师建立点对点的联系机制，借助网络将现场指导与网上观摩有机结合，实现每一组学生轮流接受线下指导和网上观摩的教学安排，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混合式学徒制度指导模式。

二是因地制宜实施现代学徒制。现代学徒制是为了发挥学校教育与实践导师各自优势的教育教学组织制度。不同专业对实践导师的需求程度不同，有些专业通过见习观摩的方式就能够实现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的转化，不一定要实施严格的学徒制；有些专业依靠集体讲座指导和研习实践场所视频即可达到预期目标，也不一定要实施学徒制进行现场指导；有的专业必须在实践现场反复磨炼才能掌握要领，达到预期培养目标，这样的专业才需要实施学徒制。这就需要政府部门联合行业协会对职业教育的专业类型进行梳理，分出学徒制培养方式的需求等级，对于学徒制需求程度高的特定专业，国家需要设立特定专业学徒制扶持政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徒制管理制度。

三是建立学徒制管理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学徒制实施。国家要充分发挥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要求全国各地成立学徒制管理委员会分会，吸纳行业、企业、政府、高校等部门有影响力的人员参与委员会。学徒制管理委员会分会还需设立日常事务管理办公室，全面负责学徒制的宣传、资源整合、工作协调、问题解决等事务，为中国特色学徒制高效运行提供组织保障。

中国特色学徒制需要系统化保障

中国特色学徒制的有效实施需要思想观念、法律制度、办学经费各方面的协同保障。其一，我国传统文化观念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有着潜在的负面影响，多数学生选择职业教育并非是兴趣和能力倾向所致，职业学校学生学习基础较差、学习动机较弱影响着学徒制实施的实际效果。其二，我国学徒制度体系尚不健全，缺乏现代学徒制有效运行的金融、财税和行政许可等配套制度，也缺乏学徒制运行效果的评价制度，企业和行业协会参与现代学徒制积极性不高，职业院校也因内外不利因素的叠加而导致推行现代学徒制动力不足。其三，学徒制的经费保障力度不够。学徒制需要一笔不菲的费用，一方面补贴企业实践导师的辛苦付出，另一方面补贴作为学徒的学生的额外开支。

要坚持集中全社会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从舆论宣传、立法、行政、经费等方面为中国特色学徒制提供全面保障。

首先，利用各类媒体加强对我国职业教育和中国特色学徒制的宣传，宣传职业教育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和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努力改变人们轻视职业教育和学徒制的思想观念，为中国特色学徒制有效施行提供思想认识保障。

其次，国家立法部门要加强中国特色学徒制的相关立法。围绕金融、税收、行政许可等方面展开立法，为中国特色学徒制的高质量实施提供法律保障。

再其次，政府执法部门要加强执法力度，按照履职尽责情况对相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及时奖惩。同时，教育行政部门要委托行业协会或社会专业组织对学徒制实施效果进行年度监测和阶段评估，督促相关部门真正担负起责任，齐心协力推动中国特色学徒制的高质量运行。

最后，政府、高校、企业联合保障中国特色学徒制的运行经费。教育是社会公益事业，职业教育主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因此地方政府有必要也有义务为职业院校的学徒制提供专项的财政补助。企业作为潜在用人单位也有责任拿出一定的利润来补贴实践导师，支持学徒制的实施。职业院校作为学徒制的实施主体，责无旁贷要承担相当比例的费用。

总之，实施中国特色学徒制要坚持“三个面向”，要立足中国国情社情，要调动全社会力量，高质量地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和中国特色学徒。

信息来源：中国教育报 2020年12月22日

作者：夏仕武，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

职业教育，各国政府持续发力

不同国家的职业教育体系各有特色。日本在精细化方面下功夫，比利时既重视现代教育又保留古老传承，德国牢牢守住双元制模式，波兰多管齐下加快发展一度沉寂的职业教育……各国政府持续发力，不断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

日本

职业培训面向所有劳动者

走在日本各城市街头，烹饪、设计、护理等技能培训课程的广告牌随处可见。完善的职教体系为日本培育了大量高技能人才，也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日本的职业教育体系主要包括学校教育和社会培训两大类。为保障职业教育长效运行，日本设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在校园教育层面，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开始，日本政府陆续颁布《教育基本法》《私立学校法》《学校教育法》等，规定在义务教育阶段设立职教课程，并建立了国立、公立和私立等不同性质的专门职教机构。此后，《短期大学设置基准》《高等专门学校设置基准》等法律的出台，规范各阶段的职教学校。

在社会培训层面，1958年，日本政府制定《职业培训法》，明确公共职教机构和企业内部培训的分工。1985年，该法案大幅修订，并更名为《职业能力开发促进法》，将职教体系的培养对象扩展至所有劳动者，提出终身培训是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

此外，日本法律对于学校、社会、企业内部等不同层面的技能培训机构如何管理，中央和地方政府、政府和企业在职教领域如何分工等方面，都有细致规定。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日本政府也不断对法律进行调整。

在健全的法律推动下，七十年代，日本基本建立了包括专门学校、高等专门学校、短期大学等在内的较完整的职教体系。根据学校类型和学制的不同，学生可获颁相当于大专学历的“准学士”“专门士”、相当于学士学位的“高度专门士”等学位。

在发展初期，日本职业学校以政府管理为主。五十年代以来，日本的校园职业教育逐渐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政府辅助的产学合作机制。该机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由职教学校寻找接受学生实习的企业，双方共同制定培训计划；另一类先由企业将学生录取为实习生，再与该学生所在的学校探讨合作规划。一些地方职业学校还通过与当地企业开展共同研究、委托研究等方式，在提升学生技能的同时，助力地方产业发展。

在面向全民的职业培训方面，日本在国家 and 地方两个层面设立了终身职业能力开发中心等机构，各类专门学校、短期大学等也通过公开讲座、开放学校设施等形式，支持各地居民

和中小企业员工的终身职业学习。对于日本大型企业员工而言，公司内部的技能培训是他们的首选。

时至今日，日本仍在不断完善职教体系，使其日益精细化。2019年4月1日，一批“专门职业大学”在日本各地正式开学。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首次设立新的大学类型。专门职业大学设有四年制和二至三年制，分别对毕业生授予“学士（职业）”和“短期大学士（职业）”两种学位。学位中的“职业”标记，是为了明确该学生接受的是基于职业实践知识的综合性培养。专门职业大学要求至少配备40%的实务型教师，学生在校期间有1/3以上的课程为企业实习项目。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2019年，日本全国短期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为98.6%，专门学校为96.6%，高等专门学校为99.6%，与大学生97.6%的就业率持平。日本职业教育的高就业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以职教机构日本教育财团为例，该机构旗下的职业学校中，留学生人数占学生总数的10%，来自41个国家和地区。据统计，游戏、设计、美容化妆、动漫插画等专业受到各国留学生的青睐。

（本报驻日本记者刘军国）

德国

从职教到就业无缝对接

德国以制造业立国，有着尊重和重视技术工人的社会文化。在德国，每年只有不到半数的中学毕业生进入普通大学。对大部分人来说，接受职业教育才是首选。德国职业教育体系以双元制为核心，由企业和学校合作，通过学徒制度共同培养职业技术人才。

德国职业教育的双元制模式源自中世纪的手工业学徒制。19世纪工业革命后，工业发展产生大量用工需求，职业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1897年，当时的普鲁士王国通过《手工业者保护法》，规定进修学校作为第二课堂，为学徒进行理论培训，确立了现代双元制的雏形。

1969年，联邦德国颁布《职业教育法》。1970年，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成立。这一变革从法律和机构层面，为双元制职业教育建立了规范。此后，德国政府根据社会发展变化不断调整政策，保证双元制教育始终适应市场需求。

德国职业教育一般为三年制，各地的职业学校近9000家，设有超过300个专业。从木匠、厨师、清洁工到钻石打磨、钢琴制作、农产品加工等，职业教育体系涵盖了几乎所有制造业领域。

在双元制职教体系中，德国企业发挥着主导作用。在全德各地，每月都会举办数十场学徒招聘会。学生一般先通过学徒招聘会与相关企业签订协议，一边实习一边在学校学习理论

知识。学生在企业实践的时间需占全部学习时间的 70%。学习期间，学生的大部分学费由企业承担。根据工作量，学生还能获得一定工资。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德国取消了大量展会，但学徒招聘会仍照常举办。双元制的教学方式以市场实际需求为指引，有效避免了学校教育与实际需求脱节的问题。从中长期看，企业培养的学生岗位适配性更高，总体成本远低于社会招聘。因此，德国企业对招聘学徒持积极态度。从西门子、戴姆勒等世界 500 强公司，到只有数名雇员的小微企业，都与职业学校有着紧密合作。

根据德国联邦政府今年 8 月公布的数据，2019 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在读人数超过 130 万人，共有约 51.3 万人签订了新的学徒合同。另据 2018 年的统计数据，约有七成的双元制学生毕业即被实习企业留用，实现从职教到就业的无缝对接。

发达的职业教育体系促进了德国青年的就业。据统计，德国青年失业率为 6.8%，远低于欧盟 16.8% 的平均水平。双元制职业教育因此被誉为“德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

近年来，德国职业教育也遭遇了挑战。一些年轻人认为技工工作单一枯燥，不愿选择相关职业。从 2011 年起，双元制学生总数逐年下降，导致一些企业的学徒岗位出现空缺。这一现象引发了德国政府和企业界的高度重视。为吸引更多学生，德国政府顺应工业 4.0、数字技术发展等新趋势，推出了相关领域的新专业。同时，德国还出台政策，促进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间的衔接融通，为学生打造更加灵活多样的个性化教育路径。

（本报驻德国记者李强）

比利时

专业技术和管理能力并重

比利时职业教育已有 150 多年的历史。1865 年，该国第一所职业学校在布鲁塞尔创办。1983 年，比利时政府将中等职业教育纳入义务教育。2014 年，该国进一步实施教育改革，强调建立贯穿终身的职教体系，并把职业教育的管理职权下放，由地方教育部门与职业学校自行商定教学内容。

比利时职业教育体系主要包括中等教育学校、高等专科学校、成人职业培训学校等机构。学生初中毕业后，可以选择继续接受普通教育，也可以转到职业教育轨道。对于已经就职的劳动者，每年有 120 小时的带薪培训时间。据统计，每年约有 50% 的比利时中学生选择进入职业学校学习。

比利时职业教育不仅要求学生学习精湛的专业技术，还要求他们掌握行业整体趋势和经营管理能力等，成为全面发展的技术人才。职业学校与企业联系紧密，学校对企业的研发项

目给予技术支持，企业则招收合作学校的学生，让他们每周能有一天至一天半的时间进行实践。

皮埃尔曾在职业学校接受过为期两年的面包师培训，让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面包店的实习经历。“培训第一年，我们的主要职责是学习烘烤面包，听取顾客意见并加以分析改进。第二年，我们的实习包括参与原材料采购、库存管理和店铺经营等方面。”这段经历让皮埃尔受益至今。他告诉记者，职业学校的学习和实践让他认识到，随着食品机械化制作的不断发展，面包师这一职业的工作范畴不再限于面点烘焙，而是包括了解顾客口味变化、进行原料成本管理、传承企业传统文化等各个方面。

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为学生创造了良好的就业前景。据统计，2019年，62%的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应届毕业生在毕业3个月内实现就业，80%的成年职业培训者在培训结束后3个月内就业。看到职业教育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一些高校也开办了职业教育课程。例如，近年来，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继续教育学院陆续开设了259项职业培训项目，学生只要具有相关专业的中等职业教育学历就有资格申请。

在专业职业教育体系蓬勃发展的同时，比利时家族技艺传承的传统也在继续。35岁的吉约姆告诉记者，他的家族企业主营水暖系统修理。从15岁开始，他的父亲每天教他看图纸、熟悉修理工具和维修技术，并带他去工作现场进行实践。尽管没有上过职业学校，他凭着丰富的实践经验顺利考取了职业资格证书，从17岁开始正式踏入水暖工行业。未来，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子承父业。在比利时，家族企业占69%，其中77.4%的家族企业规模在10人以下。一些小微家族企业保留传统，通过家庭传帮带的方式，将职业技能代代传承。这也为比利时的职业教育开辟了另一种独特方式。

（本报驻比利时记者牛瑞飞）

波兰

推动本国职业教育“复兴”

在波兰首都华沙近郊的一家大型汽车维修中心，一批学生正在专业技工手把手的指导下，进行汽车维修知识学习和实践。这些学生来自华沙第二汽车职业技术学校，这是他们每周例行的学徒培训。每个学期，这家汽修中心都会从该校招收一批学徒。学生在快速提升职业技能的同时，每月还能获得约为正式工人工资一半的津贴。每年，该职业技术学校都向波兰及欧洲各国的汽车生产和维修行业输送大量专业人才。

波兰有重视职业教育的传统。上世纪三十年代，该国就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六七十年代，波兰每年有上百万学生在小学毕业后直接进入职业学校，成为波兰实现工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进入八十年代后，波兰经济一度陷入困境，职业教育也遭遇了困顿期。一些民众不再认同原本的职教体系，认为技术工人地位低下。在此背景下，波兰大批实践基地被迫关闭，职业学校也成为很多人眼中的“次等学校”。

近年来，由于生育率低、人口流失较严重等原因，专业技术劳动力短缺成为制约波兰经济发展的因素，促进职业教育“复兴”再次进入波兰政府的规划视野。2016年，波兰通过新的教育法规，将职业教育置于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

为提升职业教育质量，波兰政府鼓励本国中小企业积极参与职业培训教育。中小企业占波兰企业总数近90%，吸纳了约85%的劳动人口。2018年，波兰通过新的职业教育法案，支持企业和雇主为学生提供实习岗位，让职教体系更加贴合市场需求。此外，波兰政府还出台专项劳动基金，对参与职业培训的企业进行税费补贴，并给予学生一定的实习津贴。2019年，波兰政府又公布了包括版画、雕塑等21项对该国文化遗产传承具有重要意义的职业列表，对涉及这些行业的职业教育提供重点补贴。

近年来，波兰职业教育不断开辟跨国交流项目，着力培养国际化技能人才，成为吸引学生的一大特色。目前，波兰有30多所职业教育院校与国外职业院校开展联合培养项目。例如，近年来，在电力系统自动化、建筑工程、设计类等技术专业，河北沧州职业技术学院陆续与波兰罗兹技术大学、西里西亚技术大学等多所职业教育院校签署了合作办学协议或学生交流协议。

波兰推出的一系列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兴趣。据波兰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8—2019学年，近半数波兰学生选择接受职业教育。然而，目前波兰的职业教育仍以汽修、建筑、食品加工等基础技能人才培养为主。波兰海乌姆国立高等职业学校校长托菲尔认为，“未来波兰职业教育的方向是培养现代化的专业技术人才，为以自动化、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为特色的工业4.0做好储备。这要求波兰在硬件建设和师资力量两方面不断进行改革创新，发展线上线下双轨职业教育体系。”

（本报驻波兰记者于洋）